

认同熔铸与神圣时空：文化记忆视阈下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

史靖昱

【摘要】作为文化记忆之存储空间与形塑国家认同的有形基础，民族团结誓词碑跨时空凝结着记忆与事件、政治、认同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文化记忆”为主要分析概念，借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个案，在实践层面探讨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与其中所涉之记忆政治。文章首先追溯誓词碑“记忆-遗忘-唤醒”的历史经过，剖析从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以服务国家认同之缘由；其次，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誓词碑提升国家认同的模式；最后，将作为记忆之场的誓词碑置于空间生产的脉络之中，分析纪念空间的功能与意义的变迁，阐明空间如何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并塑造出国家认同的日常赓续模式。

【关键词】文化记忆；记忆之场；国家认同；纪念空间；誓词碑

【作者】史靖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山东青岛，266100。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2)05-0138-0010

一、引言

(一) 问题由来

纪念碑本身是国家话语和政治权力建构出兼具实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的“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呈现”着形塑国家认同的“关键性时刻”(Defining Moments)。^①通过“政治仪式”的操演与重复，集体在“神圣时空”中与纪念碑对话，唤醒凝聚于其中的集体记忆，获取集体情感与历史能量，达成集体记忆与信仰的回溯，从而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建构“记忆之场”并通过仪式唤醒集体记忆赋能国家认同乃当今民族国家时代普遍的政治文化与技术，中国天安门广场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国国家广场中心的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德国新柏林的“欧洲被谋害犹太人纪念碑”(National Memorial for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和胜利纪念柱(Siegestsäule)、俄国莫斯科的“莫斯科胜利纪念碑”(The Victory Monument)，均属此列。

从国家认同的整体性角度来考察，这些形塑国家认同的记忆之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各民族国家范畴内所有承载国家历史关键性时刻的记忆之场共同联结为支撑整体性国家认同的“记忆

^①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在哈布瓦赫“回忆形象”基础上提出“记忆之场”概念。其认为，文化记忆的存在和唤醒离不开“神圣时空”及特定的社会框架、特定的群体，它们不仅支撑着记忆，而且反作用于记忆。因此，记忆植根于兼具实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的集体的“场所”中，包括档案、图书馆、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标志性建筑等“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的场所，“记忆之场”是这些“场所”的上位概念。就此定义，纪念碑属于兼具实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的记忆之场。

之网”，记忆与认同的洪流在其中涌动，为全体国民传递着集体的过往、荣耀与苦难。因此，对形塑国家认同的记忆之场的整体性研究与讨论，应从“中心”与“边疆”两方面着手。然而，目前的研究却形成“两极分化”的形态，主要集中于“中心”的国家首都记忆之场，而对“边疆”的形塑国家认同的记忆之场的关注度则明显不足。作为形塑中国边疆国家记忆和认同的有形载体，建立于普洱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成为剖析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确立与深化的一个窗口。

（二）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与个体记忆不同，国家中的国民没有一个共同的神经结构，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1]26}本文以“文化记忆”为主要分析概念，以地方一手史料、口述资料、官方文书和相关论著为基础，借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个案，论证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之熔铸与深化所涉记忆政治。之所以选取民族团结誓词碑，一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边疆实践取得成功的全国少有的物证，是特殊时期“请上来，派下去”政策的直接产物，辐射范围广泛、参与民族众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清晰透射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确立与深化之路径。二是从记忆的流变和意义的转化来看，誓词碑在集体记忆中经历了“记忆—遗忘—唤醒”的过程，其意义也经历了“纪念事件—储存记忆—深化认同”的转化，能直接体现出政治权力通过“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的转化来支撑国家认同的记忆政治。三是从县域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誓词碑从踏脚石到纪念空间之中心的变迁路径透射出国家话语、地方权力和公众意志在空间生产中的博弈与妥协，而纪念空间之“民主化”进程则体现了国家塑造认同常态化机制的政治文化技术。因此，通过考察誓词碑意义作用之流变与纪念空间的构造，边疆记忆之场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得以充分呈现。

当前，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铸牢国家认同”，对于中国大地上广泛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说，要探索出强化少数民族同胞国家认同的方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培育国家认同的常态化机制。而文章所述之“民族团结誓词碑”个案则以文化记忆的视角尝试性探索出一条实践层面筑牢国家认同的现代化路径，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一种经验性模式，也为深化国家认同和保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二、对抗遗忘：记忆之唤醒与载体的“重建”

1951年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期间，26个少数民族（含支系）的代表同3000余名群众在普洱黄场举行剽牛仪式、喝咒水、宣读《民族团结誓词》，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并立于中共宁洱地委（今宁洱县老政府）门前的榕树下。^{[2]25}作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记忆的载体，誓词碑成为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机生长点。盟誓代表返回原籍地后，通过开团结会、吃团结饭、讲团结故事等形式分享思普专区少数民族形塑国家认同的历史关键性时刻，即进京观礼、剽牛盟誓和建立誓词碑，并以此为依托向少数民族同胞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理念，构筑集体的国家认同。此时，观礼盟誓等形塑国家认同的事件在交流过程中被纳入集体“象征意义体系”（Symbol Universe），成为鲜活的“交流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并在一传十、十传百的口耳相传过程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弥漫于普洱专区和周围地区的不同人群之中。交流记忆的扩散使普洱人民意识到了全体中国人民之间所具有的历史性的共同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

誓词碑的意义是语境化的，在不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也正是由于当下和过去尚未分离，在事件发生后的近三十年间作为事件直接产物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本体实际并未发挥记忆之场的作用，而在集体视野中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甚至于“文革”期间被拆除扔至水房门口做踏脚石，被集体遗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誓词碑虽被民间工作者陈启富重新发现，^{[3]附录}但未受重视，仅被移至文化馆中贮藏，仍然消失于集体的视野中。随着进京和盟誓代表的相继离去，誓词碑符号所承载的交流记忆开始淡化并逐渐消逝，尤其是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文化断裂之后，被集体所“遗忘”，成为社会的“储存记忆”。阿莱德·阿斯曼认为，一般而言，每种文化都会创造一些方式防止无情的和普遍的持续遗忘，保证社会文化身份的有效传递和持续保存。^[4]断裂结束后，集体开始寻求方式来确保身份和国家认同的连续性，在国家推动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边疆少数民族尝试性探索出一

条对抗遗忘的路径:将交流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重建”记忆之场。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成立成为民族团结誓词碑记忆之场“重建”的起点。从县到自治县行政区划的转变一方面意味着地方获得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治区域应承担起团结各民族、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责任和义务。为落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精神、满足集体自身持续性的要求,地方政府开始推动观礼盟誓的交流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重建”誓词碑记忆之场。

1985年,中共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将闲置于县文化馆中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进行修缮,安置于象征着政权权威的政府大院之中。同年地方报《普洱县志通讯》首次刊登了关于誓词碑历史的文章,称其为“滇南民族团结第一碑”,^{[2]25}使之逐渐进入了集体的视野。1986年,地方政府将誓词碑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①,县委主导县政协、县志办、县党史办开始进行系统的誓词碑历史梳理整编。由于文字资料留存较少,以鲁国华、马静、黄桂枢为代表的工作者走遍原普洱专区辖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沧源佤族自治县)访谈仍在世的代表或代表亲属,进行口述记录、签字代表姓名考证等工作,^{[5]163-167}将留存于亲历者或相关人员脑海中的个体记忆注入到文字媒介之中,转化为文化记忆。大规模的历史整理工作的开展使其他州市县的人们重新唤起了关于誓词碑的记忆,同时也激励了沧源、西盟、景洪等地方政府进行誓词碑历史回溯和整编。

集体“重建”民族团结誓词碑这一纯粹实在性的记忆之场的根本原因是让时间停滞、停止遗忘。通过有形的誓词碑将流动的时间和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国家认同和抽象的民族团结观念化为有形,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于最小的标记之中。^{[6]15}民族团结誓词碑使记忆的强制力以坚定且不加区分的方式施加于个体,让个体通过回想复活过去、复活普洱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关键性时刻,而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变成过去的现在则通过这种连接和寻根行为得以更新,得以现实化为当下,为个体提供归属感和国家认同。

1991年,在黄桂枢的建议下,思茅地委、行署(现普洱市委、市政府),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现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在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行了隆重的“全区民族团结工作会暨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40周年纪念大会”,受到多方的高度关注。云南省人大、民委、统战部,西双版纳州、临沧、思茅区的领导干部及近万名各族干部群众参加了活动,亲历立碑盟誓的召存信、刀卉芳、张瀚臣、肖子生、马朝真、方有富、张绍兴7位代表在会议上重新聚首。与会集体在仪式性的反思中坚定跟党走的决心,深化对祖国的认同。在纪念大会上,经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会议上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号召人们重温誓言,一心一德跟党走。^{[7]120}实际上,此次纪念会议是在当下和过去出现明显分隔后,唤醒凝聚于民族团结誓词碑中的文化记忆的第一次政治仪式。一方面,通过仪式的操演,集体在“神圣时空”中与誓词碑对话,将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关键性时刻拉回现实的框架内,唤醒凝聚于其中的集体记忆,使集体获取集体情感与历史能量,达成国家认同的深化;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合力下,民族团结誓词碑记忆之场受到了国家的关注,扩大了记忆之场的辐射范围。由于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独一无二性,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价值,国家开始参与记忆之场的构建中。2006年,民族团结誓词碑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列入第六批“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了从边疆到国家记忆之场的升格,成为国家记忆的载体,并被纳入支撑全国人民整体性国家认同的“记忆之网”之中。

在国家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下,作为誓词碑及所涵之文化记忆开始进入全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2020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普洱市拉祜族代表何春建议将民族团结誓词碑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统编教材,得到教育部重视与回复:“‘民族团结誓词碑’作为滇西南26个民族团结爱党的历史见证,对推进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经研究,拟在道德与法制教材中以图片的形式呈现民族团结誓词碑,或在相关教师用书中介绍相关内容。”^[8]统编教材是国家意志的根本体现,是教育国民和形塑“国民”身份的基础。教育部将誓词碑编写入中小学全国统编教材,一方面意味着国家对誓词碑及其所涵之文化记忆的重视,以及通过

① 民族团结誓词碑碑刻。

它引导社会主流价值、倡导民族团结进步的期许；另一方面则代表着誓词碑成为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政治文化符号，成为形塑公民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此外，民族团结誓词碑还成为国际视角下形塑国家形象和宣传国家理念的重要文化资源。时值建碑7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9月21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的文章，向全世界人民讲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代表进京观礼、剽牛盟誓，最终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9]此举意味着誓词碑成为建构民族团结进步的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资源，通过百姓视角和故事化叙说向全世界人民讲述中国故事，阐释着中国的民族团结理念。由此，誓词碑成为形塑国民国家认同和建构国家形象的记忆之场。

三、熔铸认同：“传统的发明”与记忆再生产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承载着基于进京观礼和剽牛盟誓为开端的历时性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是“巩固根基式记忆”的“客观外化物”，具有支撑回忆和索引认同的技术性作用。对民族团结誓词碑及其承载的文化记忆的活化、唤醒与利用，成为培育和深化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技术。

（一）“传统的发明”与认同的深化

为响应中央深化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号召，1985年，民族团结誓词碑记忆之场的重建工作开始后，中共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开始围绕其进行“传统的发明”^①，突出表现在周期性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大会的召开和民族团结活动日之确定。

1991年第一届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大会在普洱隆重召开，大会即兼具象征性和仪式性之被发明的“传统”。从象征性来看，纪念会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是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情感表达，核心目的在于回溯一心一德跟党走的历史，回望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深化民众对祖国的认同。从仪式性来看，纪念会可看作一次政治仪式，集体的操演使仪式与日常生活相分割，个体在仪式氛围中获得超验的感知和集体的认同。通过万人重温民族团结誓词、瞻仰民族团结誓词碑、共饮同心酒等带有仪式性色彩的身体实践，将进京观礼、立碑盟誓、“上来下去”等集体历史的关键时刻重新拉回当下的框架之中，实现集体在时间阈之中的回溯并给予集体“来自记忆的能量”，使集体获得过去与当下的连续感。同时，承载于誓词碑中被侵略者、国民党压迫的创伤记忆和生活贫困艰苦、“天上星多夜不明，路上坑多路不平”^{[10]28}的苦难记忆也被仪式所唤醒，并与一心一德跟党走翻天覆地四十年的记忆成为鲜明的对比，深化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巩固了党的政权合法性。

作为意义循环和认同深化的交际空间，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大会成为周期性的“传统”。随着国家力量的参与，举办频率逐渐提高，规模也随之扩展，并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随着“传统”影响力的扩大，形式和活动也愈发丰富，参与民族和群众也逐渐增多，而民众也在政治仪式的展演中深化了对国家的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举行的建碑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有一项特殊的活动——剽牛仪式。这一仪式致敬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起点——剽牛盟誓，通过模仿性的身体实践将集体历史的关键性时刻拉到现实的框架内，唤醒承载于记忆之场之上的文化记忆。此次剽牛仪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本身还是一个“祛魅”仪式。五十年前剽牛仪式是带有迷信色彩的“通过仪式”，起到的是“认同阈限”过渡的作用，通过看“神的旨意”才决定是否跟党走，盟誓是否成功。而五十年后的剽牛仪式则是承载着文化记忆的文化媒介，其作用在于通过“一个清晰的星簇”（a constellation of legibility）的触发唤醒过去的记忆，深化人们的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用五十年的边疆实践在少数民族中实现“祛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的愿望。

^① 埃里克·霍姆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提出了“发明传统”（Inventing traditions）的概念，认为“被发明的传统”指的是人类社群所生产的一整套具有象征性和仪式性的实践活动。通过对实践的不断重复和操演，达成建构群体认同、保持一致性、确立价值和行为规范、确立合法性等目的。

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大会这一宏大的“传统”之外,地方政府还发明了众多“子传统”以在日常生活中唤醒文化记忆。如在普洱县委的推动下,每年元旦被从日常时间中分割出来,成为“民族团结活动日”,通过这一节日,对奠基式的历史时刻进行现实化,对起着巩固根基式作用的回忆形象进行现实化,使群体确认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此外,地方政府还在“三个离不开”政策和“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目标的指引下,发明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庆典活动”“民族团结月”“民族团结活动周”“军警民共建民族团结”等“传统”,^[11]建立起铸牢国家认同的常态化政治技术。

(二) 记忆再生产与认同铸牢日常机制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巩固根基式历史时刻的记忆之场,受国家权力的关注,其所承载的文化记忆被群体“栖居”(inhabit),从“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功能记忆指的是为集体提供认同、为当下提供合法性而被刻意“呈现”出来的记忆,誓词碑所承载的功能记忆对构建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集体开始将誓词碑的文化记忆作为“文本”而不断进行再生产,使其通过书籍、影视剧、演出、展览、绘画、摄影等多种媒介形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构筑铸牢国家认同的日常化机制。

1985年民族团结誓词碑记忆之场的“重建”工作使誓词碑重新进入集体的视野中,而后在国家 and 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以誓词碑为母本的文化记忆再生产活动随之展开,并源源不断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1985~2021年间,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记忆的再生产作品主要有文学作品、绘画、歌舞剧、影视节目四大类,经历了起初主要由政府推动,到后期政府民间共同举办的发展形势。早期,由于誓词碑在集体中的影响力较小,其文化记忆的再生产行为主要是由政府推动,并集中于文学作品形式。如在建碑40年之际十余位党政人士和民间作家写就的《小重山·祝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四十年》《瞻仰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二首》等诗词。^{[12]8~1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桂枢的《题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言简意赅阐释了历史事件和誓词碑之意义:

古诚盟会议同舟,思普九江汇海流。
咒水共喝心向党,头人起誓手割牛。
石碑一块留宁洱,青史千年载地州。
半百芳名垂后世,边疆永固保金瓯。^{[12]10}

随着建碑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先后被《普洱日报》《云南日报》等多家大众媒体报道,誓词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提高,民间力量也开始介入誓词碑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如1992年由鲁国华有著《碑魂》民族团结誓词碑史料集中就整理了根据李晓村、赵卓等人的口述写著的文学传记和故事。^{[13]138~141}199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民族团结誓词碑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吸引了原普洱专区的民间作家也开始进行多形式的文学创作。1998年黄尧有著的《世纪木鼓》以佤族人民的视角讲述了誓词碑建碑之前佤族的苦难史和建碑后民族团结的欣欣向荣景象^{[15]161~409};1998年征鹏有著的《从领主到公仆》从观礼盟誓代表召存信的生平经历出发,讲述了誓词碑建碑的经过和西双版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变^{[16]75~243};2000年刘志强的《盟誓丰碑》是以口述资料为基础写著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誓词碑建碑的历程^{[17]46~223};此外,还有马静和鲁国华有著的《碑魂》电视文学剧本,开始尝试文化记忆的多形式再生产^{[12]13~120}。这些以誓词碑为基础的文化记忆再生产作品构成了一个国家认同的历时性支柱,该支柱通过将文化记忆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来保持个体与国家的内在关联性,深化个体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的稳固程度取决于它在国民意识中的活跃程度以及它如何促成国民的一致性行为。^{[8]113~115}在这一意义上,通过誓词碑多形式的再生产和传播弥漫,实现民众日常生活中文化记忆的不断唤醒,文化记忆在个体脑海中的活跃程度越高,而国家认同也就越稳固。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誓词碑的文化记忆再创造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记忆的再生产还同科技进行紧密结合,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同时也是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七十周年,为纪念和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中共普洱市委举办了大型文艺晚会“誓言如钟70载”,结合AR、全息投影等新媒体技术,编排了以誓词碑为核心的情景舞蹈剧《同心筑》、情景舞蹈《剧变》《幸福家园》、

歌曲《宾弄赛嗨》、大型花灯歌舞剧《盟誓》等沉浸式节目，以数字技术将集体历史的关键性时刻拉回当下的时间框架，在沉浸体验和情感共鸣中深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以文化记忆的载体为母本进行多形式再生产乃一国家深化国家认同的日常化机制，政府和民间的合力使众多以誓词碑文化记忆为核心的经典艺术作品得以产出，它们成为储存和传达文化记忆的文化媒介，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能忘记侵略者带来的创伤记忆、不能忘记生活贫苦的苦难记忆，应该记住一心一德跟党走和民族大团结带来的幸福生活，在回忆和对比之中，深化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四、空间意义之流变与民众日常生活

“记忆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它被锁定在空间之中。空间本身具有唤醒记忆的某种力量。”^[18]⁴⁰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记忆叠加的对象，民族团结誓词碑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保持“纯粹性”并发挥其唤醒和纪念之功能，由此便提出独立纪念空间建构的要求。然而，空间本身却不仅仅是“事物存在的空间”，更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不同权力话语基于特定目的博弈之场域。誓词碑所承载的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确认国家认同的历史关键性时刻，故其纪念空间之构建必然涉及国家力量的主导与参与。诚如马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作为国家纪律力量的根本与体现，功能性与象征性空间之建构，涉及统治者适当处置事物与时空的合理化技术，故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现代性之空间与物质建设基础的一环。^[4]国家力量通过对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空间的生产，一方面将文化记忆和流动的意义整合固定在特定的空间中，让无形的国家认同和抽象的民族团结观念化为有形，以可知可感的方式深化群体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将流动的时间和状态固定下来，让时间停滞，让遗忘停止，将过去与当下进行连接，为群体深化国家认同增加连续性的历史感。同时，纪念空间的意义和其中的文化记忆也会随着社会实践而进入开放性的“社会生产”阶段，并随主导话语、时代环境和功能流变而不断更新。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了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化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国家认同的深化与再深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此一空间、文化记忆、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为此部分之论述框架与核心。

（一）空间更名与意义流变

1985年民族团结誓词碑被安放于象征着国家权威的政府之中，“重建”为集体的记忆之场。随着参观致敬人数的增加，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决定另辟一处以民族团结誓词碑为核心的纪念空间。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空间冲突。为充分发挥誓词碑政治教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功能，需要一独立空间标识其纪念性，并陈列相关的史料文物，以供游客参观学习。然而政府大院空间明显不足，而过多参观人员参观也会影响日常办公，造成参观空间和行政空间的冲突。^①其二是迎接盛会。誓词碑五十周年纪念会将至，吸取第一届纪念会之经验，需一开放空间举行纪念仪式和活动，以表县域精神与所提倡之民族团结观念。于是，县人大代表在省人代会上提出了新建一民族团结誓词纪念空间的议案，得到省人大和省民委的政策支持。^[19]

在多方征询意见后，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决定将中山公园进行重建，并改名为“民族团结园”，安置民族团结誓词碑。^[20]普洱中山公园历史悠久，1929年国民党通令在全国废除道制以加强对地方控制，国民党在普洱设“普洱第二殖边督办公署”，“以为边地行政救济办法”，^[21]¹¹¹³作为掌握行政权的政府机构管辖原普洱道范围内的行政事务。为彰显国民党对孙中山的继承地位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施政治教化，1933年公署在县城西北侧建“中山纪念堂”，将其周围空间命名为“中山公园”^[22]⁴³⁶，并保留至2000年^②。“任何一个空间的命名实际上都是一种观念、意识对空间进行控制的体现，改名更是对原有空间意义的重构，反映出改名者对空间新生意义的强调。”^[23]2000年

① 访谈人：民族团结研究所所长 WZY 女士；访谈地点：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访谈时间：2022年1月24日。

② 访谈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土肥站、农经站工作人员 SZK 先生、BYX 女士；访谈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通过电话采访；访谈时间：2022年4月13日。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将中山公园更名为“民族团结园”一举,是对共产党诠释孙中山符号的正当性的肯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理念的承递和更新。

中国共产党上执政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丰富和更新了孙中山的民族平等理念,并将其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意志,并以实际行动贯之。正如签字代表肖子生所说:“以前旧中国是大汉族主义封建统治的中国,现在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民的新中国,我们要团结友爱,使中国成为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24]而民族团结誓词碑,即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念实践的产物。因此,将中山公园改建为放置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民族团结园”,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民族理念的承递和发展,是对历史遗产的更新,更强调出空间重构后承接党现行民族理念的意义。

(二) 话语交叠与空间生产

在选定园区空间位置之后,普洱县委开始着手空间的布置和规划。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民族团结园的设计规划属于“空间表象(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维度,对应着“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25]48~52;337~355这一空间“体现了统治群体掌握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表象化,空间的再现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中隐含的秩序紧密相关……并且通过呈现了通知符号的建筑方案来发挥作用”^[26]。空间中隐含着无数的社会关系,民族团结园的设计和规划是话语权力叠加和博弈的场域,需要调和国家、省委、市委和民众的要求。于是,经由诸多考虑、协商和调和后,纪念空间的规划设计在外形和内涵两方面有所突出。

在外形方面,民族团结园是安置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纪念空间,需要将抽象的国家观念和民族团结理念化为有形,所以要在外观上有所体现,突出纪念空间的神圣色彩。在整体布景上,民族团结园大体上承袭了中山公园原有空间范围和建筑^①,占地面积443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83平方米^②,突出特点是在科技大楼(原“中山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修建面积约两百平方米的高三米的圆柱形大理石石台,以凸显誓词碑之神圣色彩,供人瞻仰。石台正面镶嵌着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9月31日国宴上为各民族代表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十四个金色大字及“毛泽东”签名。南北两侧环绕式阶梯盘旋而上,中心修建古典六角式青灰琉璃瓦碑亭,而民族团结誓词碑安置于碑亭中心的双手托举造型的石制须弥座上,象征着各民族万众一心、亲密团结、携手共进、共同发展^③。在建筑方面,将作为园区主体建筑的科技大楼(由中山纪念堂改建)进行重新翻修和仿古彩绘装饰,基本结构与原建筑保持一致,改为“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史陈列馆”。在外观塑造方面,在园区入口处建造青灰琉璃瓦盖面的牌坊式古典大门并用围墙包围整个园区^④,将民族团结园从整个县域空间中分隔出来,成为“神圣空间”。

民族团结园的核心功能是实施政治教化、纪念历史事件和凝聚国家认同,因此在内涵构造方面需要有配合作为中心记忆之场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相关的文物遗存和连续性的历史文本支撑、解读和阐释,连接过去与当下,为群体深化国家认同增加连续性的历史感。在政府的支持下,县民宗局开始组织人员先后到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思茅市各县等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积极开展民间文物收集工作,并放置入“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史陈列馆”之中。陈列馆共分为三个展室,第一展室为行政区域沿革,包括普洱行政区域变迁和历史上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展室为建碑历程,包括普洱专区动员少数民族代表进京观礼,返普洱后的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以及剽牛立碑盟誓。^[27]第三展室则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洱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三个展室环环相扣,丰富了民族团结园的内涵,连接了历史与当下,连接了普洱与全中国,将流变的文化记忆固定于民族团结园之中。

民族团结园的建造投射出国家和地方透过权力关系网络和社会实践复制国家认同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而赋予一个空间以意义的过程,其建成,成为承载着文化记忆、国家认同、价值意义的

① 访谈人:曾于1994~1997年间在普洱中山公园科技大楼经作站工作的BYX女士;访谈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通过电话采访;访谈地点:2022年4月8日。

② 民族团结园导游词。民族团结研究所所长WZY女士提供。

③ 访谈人:民族团结誓词碑签字代表方有富之子FCB先生;访谈地点: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谦岗村;访谈时间:2021年7月24日。

④ 民族团结园导游词。民族团结研究所所长WZY女士提供。

“神圣空间”，被表征为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符号。

（三）空间民主化与民众日常生活

民族团结园是权力话语叠加的对象，国家政权、地方政府、社会力量、普通民众分别处于话语权力建构的不同位置，形成层级性的互动式权力格局。由于纪念性空间之营造是国家纪律力量的根本与体现，空间本身即带有神圣性色彩，与群众日常生活空间相区隔，唯有特定时间基于特定目的才会前往参观。然随地位之升格与知名度扩散，空间本身成为城市的符号，空间意志则成为城市精神之象征。为更好地发挥政治教化之效能，空间管理者开始对空间本身进行反思，尝试营造“开放的纪念性”之空间精神。^[28]^{193~226}最终在多方合力下，空间结构的更改推动了空间民主化进程，民族团结园最终嵌入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并创造出国家认同的常态化赓续模式。

作为多方话语叠加的纪念空间，自建成起民族团结园就向社会公众开放，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认同培育的职能。在地方政府纪念仪式和大型活动的操演下，民族团结园受到官方重视和多方媒体的报道，吸引了众多省市内外甚至是国外的群体和游客前往参观。据统计，从2001年起，平均每年有4000余人前往参观，到了2004年参观人数已近两万人。^[29]而后，随2005年全国开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仅一年间，就有218个参观团共3万余人到普洱民族团结园进行参观学习，充分发挥了实施政治教化和培育国家认同的职能。^[30]然而，空间管理者对参观群体的参观时间和人员构成进行分析后发现，至民族团结园参观学习的时间高峰集中在清明节、青年节、建党节、建军节等节庆时段，日常参观较少；参观人员大部分是有组织的党政人士、机关单位、大中小学院校师生等群体。^①因此，虽然民族团结园的参观人数较为可观，却没有完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特定群体在特定时间基于特定目的才会前往参观学习。加之空间管理的规章制度有不合理之处，如不对散客开放等，未能使纪念空间充分发挥突出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认同培育之职能。

随着2006年民族团结园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后，空间重要性和知名度上升。为充分推广民族团结誓词碑县域品牌名片，地方政府操演了“万人重温《民族团结誓词》”“万人共饮同心酒”等活动，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新社等40余新闻单位及全国各省市县媒体的广泛报道。^[31]同时，在地方政府的申请下，民族团结园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充分利用誓词碑这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地方政府和空间管理者开始进行反思，尝试让空间面向更多的群体并营造出一种“开放的纪念性”之空间精神，将其打造成宁洱县域精神的象征和县城地标。^②

在多方力量支持下，地方政府开始进行空间的再生产，对空间结构进行重组和升级。一方面，为凸显“开放的纪念性”之空间精神，地方政府对空间的整体布景进行改造。首先，包围空间的“四周相连成长龙形的围墙”被拆除，“青灰琉璃瓦盖面的牌坊式古典大门”被内移，将刻意营造的空间区隔抹除，融入县城的整体空间。其次，将凸显神圣性的三米高的大理石圆柱形石台改为层级式阶梯，参观者可以经由台阶直达誓词碑，凸显出空间的民主特性。再者，将园区内修建的民族茶艺馆拆除，把“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史陈列馆”和“民族文化长廊”进行合并，命名为“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馆”，保持空间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发挥面向全体民众的爱国主义教育职能，纪念馆的文物和文史资料得到重新规整，总展名称被命名为“民族团结的丰碑”，由“铸就丰碑”“民族团结华章”“茶源道始”三部分组成，系统地将思普区红色革命、进京观礼、立碑盟誓、民族团结所取得的成绩等文化记忆呈现出来^③，连接过去与当下，连接国民与国家。重组后的民族团结园纪念空间从2017年12月31日起正式向社会开放。同年，宁洱开始打出“茶源道始，盟誓之城”的县城品牌口号，誓词碑成为了城市精神的象征。

在多方合力下，带有神圣色彩的纪念空间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访谈人：民族团结研究所研究员 ZL 先生；访谈地点：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访谈时间：2021年7月22日。

② 访谈人：民族团结研究所所长 WZY 女士；访谈地点：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访谈时间：2022年1月24日。

③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纪念馆记录。

其一,至民族团结园参观学习的人数日益增加,受众扩大到了县域内的群众百姓和外来游客,而纪念空间也更加充分的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认同培育的职能。其二,民族团结园成为人们游憩的场所和日常生活的空间,空间重组后的民族团结园成为县域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园内设有石桌、石椅,散步的人们常聚于此畅聊人生百态,老人会为后辈讲述誓词碑的故事,让文化记忆代际传递。其三,民族团结园成为县域的符号,成为“盟誓之城”的表征,广泛弥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方面,县域中的道路、广场、公园、街边的烧烤店等生活空间都设有关于民族团结园的摄影作品和创意绘画,其成为融入人们日常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民族团结园成为了市民的“打卡圣地”,并以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跨时空扩散于网络空间之中。从2000年~2022年,在多方话语交织与叠加下民族团结园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改建、五次修缮装修,从充满神圣色彩的空间变为了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纪念空间,完成了“空间民主化”的转向。民主化的纪念空间作为一种生产性力量,创造出县域民众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出国家认同的日常化赓续模式。

五、结语：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

就“国家认同”这一术语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文语境中几乎无人使用。^[32]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国际形势剧变与“颜色革命”“文化入侵”的兴起,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才日益凸显。1988年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本在学理上梳理了“国族”“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后,我国“国家认同”的学术研究才开始起步。三十余年以来,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丰硕,然却主要聚焦于理论层面和宏观领域探讨,实践层面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并未受到重视。为此,文章引入了“文化记忆”理论,借“民族团结誓词碑”为个案,在实践层面探讨了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

本文认为,民族团结誓词碑本身是国家话语和政治权力建构出兼具实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的记忆之场,承载着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形塑国家认同的文化记忆。对誓词碑及其中“巩固根基式”文化记忆的唤醒与利用,是国家熔铸与深化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技术。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技术性运用具体体现在传统发明、记忆再生产与空间生产,由此构筑神圣时空与日常生活中深化国家认同的模式。多方话语的叠加形塑了民族团结园纪念空间,而空间本身也成为记忆之场,并与宁洱县烈士陵园、磨黑镇思普革命纪念馆、普义乡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谦岗村方有富生平事迹馆、勐先乡宣德村蚌扎小组陈列馆等周围地区的记忆之场共同连接为普洱人民国家认同的记忆之网。同时,全国的地方记忆之场也与国家中心记忆之场相连接,共同构筑了支撑全体国民国家认同的记忆之网,记忆与认同的洪流在其中涌动,为全体国民传递着集体的过往、荣耀与苦难。当下,党中央高度强调要“筑牢国家认同”,本文研究之个案中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技术性分析为新时代“筑牢国家认同”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 [1] 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2] 普洱县志办.滇南民族团结第一碑——“民族团结誓词碑”史[Z].普洱县志通讯,1985(2).
- [3] 鲁国华.碑魂:民族团结誓词碑史料专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
- [4] 阿莱达·阿斯曼,陶东风.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文化研究,2020(3).
- [5] 鲁国华.记录一段历史 做民族团结的见证者[Z]//周少仁.红色誓约.宁洱:中共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2021.(内部资料,未出版)
- [6] Pierre Nora.Realms of Memory[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 [7] 马静,愚鲁.碑魂[Z].普洱: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印刷厂,1999.
- [8] 李芳,皇甫丹霖.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N].云南政协报,2022-03-11(05).
- [9] 齐欣.“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9-21(01).
- [10] 存文学.我们的太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1] 中共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委、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茶源道始——宁洱[Z].宁洱: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印刷厂,2015.

- [12] 马静, 愚鲁. 碑魂(电视文学刷稿本)[Z]. 普洱: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印刷厂, 1999年.
- [13] 鲁国华. 碑魂[Z]. 普洱: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印刷厂, 1992.
- [14] 黄桂枢. 论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J]. 民族研究, 1994(6).
- [15] 黄尧. 世纪木鼓[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16] 征鹏. 从领主到公仆[M].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 [17] 刘志强. 盟誓丰碑[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 [18] 孙逊. 奈保尔空间记忆的并置: 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19] 贺薇. 让丰碑精神永远昭示后人——访普洱县“民族团结园”[J]. 今日民族, 2005(6).
- [20]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网.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辉煌成就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史: 九[EB/OL]. (2018-02-28)[2022-04-14]. <http://ne.gov.cn/info/1195/9985.htm>.
- [21]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续云南通志长编: 上册[Z]. 昆明: 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 1985.(内部资料, 未出版)
- [22] 云南省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志[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 [23] 陈蕴茜. 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J]. 史林, 2006(1).
- [24] 卓人政. 由押人质到建民族团结碑——记1950年云南民族代表团国庆观礼[J]. 百年潮, 2009(12).
- [25] [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26] 孙九霞, 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J]. 旅游学刊, 2014(5).
- [27] 贺薇. 让丰碑精神永远昭示后人——访普洱县“民族团结园”[J]. 今日民族, 2005(6).
- [28] 李恭忠. 中山陵: 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29] 龙肖毅, 尹可丽. 普洱民族团结教育修学旅游开发[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4).
- [30] 马飞. 落实“四个到位”开创普洱民族团结新局面——普洱县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考核工作连获七年一等奖侧记[J]. 今日民族, 2006(12).
- [31]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网.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辉煌成就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65周年纪念活动: 三十九[EB/OL]. (2018-02-28)[2022-04-14]. <http://ne.gov.cn/info/1195/9993.htm>.
- [32] 李瑞君.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认同”研究概述[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0(6).

SACRED SPACE TIME AND IDENTITY MELTING : A STUDY OF NATIONAL UNITY MONUMENT UNDER THE THRESHOLD OF CULTURAL MEMORY

Shi Jingyu

Abstract: Using "cultural memory" and "field of memory" as the main analytical concepts, this paper uses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unity pledge monument" in Pu'er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politics of memory involved in building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field of memory. The article begins by tracing the "national unity monument" in Pu'er. The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history of "memory-forgotten-awakening" of the pledge monument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tored memory to functional memory to serve national identity.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pattern of national and local power in forging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oath monuments and elucidates the political memory techniques involved. Finally, the monument as a field of memory is placed in the midst of controversies and compromises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changing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memorial space are analyzed to illustrate how space, as a creative force, influenced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shaped the daily continuity patterns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Realm of Memory; National Identity; Memorial Space; Pledge Monument

〔责任编辑: 俸代瑜〕